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顾问 任继愈 庞朴

主编 王中江

于春松 著

超越激进与保守

——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

中州古籍出版社

中国
社会科学院
哲学社会科学
创新工程
重大项目
成果出版工程

中国史学

超越激进与保守

——中国革命与现代化理论之反思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顾问 任继愈 庞朴 主编 王中江

超越激进与保守

——张岱年与综合文化创新观

于春松 著

中州古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超越激进与保守:张岱年与综合创新文化观/干春松
著.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9.4
(中国哲学前沿丛书)
ISBN 978-7-5348-3154-6

I. 超… II. 干… III. 张岱年(1909~2004)—哲学思想—研究 IV. B261.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3101 号

Chaoyue Jijin yu Baoshou

超越激进与保守

出版社:中州古籍出版社

(地址:郑州市经五路 66 号 邮政编码:450002)

发行单位:新华书店

承印单位:郑州新星印刷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640mm × 960mm 1/16 **印张:**18.25

字数:230 千字 **印数:**1~4000 册

版次:2009 年 4 月第 1 版 **印次:**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26.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总 序

当回首 20 世纪近百年来中国哲学的摸索和研究历程并前瞻和期望一种新的可能之际，中国哲学的一些研究者们开始自觉地寻找改变现状和获得新的契机的途径。人们常说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学问和学术，但是，作为我们这个时代学问和学术一部分的中国哲学是什么呢？我还不知道用什么合适的词来概括它的类型。一定的迹象显示了观察的方法和研究的方式的多样性，不过要说到在这种多样性中究竟有何种“典型”范式和原创性恐怕就令人踌躇和惶恐了。人们不时地都在抱怨以往研究工作中的缺陷并相信发现了导致问题的根源，但深思熟虑地检讨和反省则非常罕见，在惊人的说法中却是惊人的轻率和漫不经心。

在此姑且拿“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正当性问题来说。相应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人们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认同感的增强，大家对运用西方范式理解和解释中国哲学所产生的许多生搬硬套的不良影响深感不安。在人们开始对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观察中国哲学这种常见方式产生怀疑的时候，有人甚至对通用已久的作为代表“中

国学问”一个方面的“中国哲学”这一术语本身也发生了动摇。理由好像是说，“哲学”这一概念是“西方的”，它生长于西方并适合于西方，它所承负的那一大套东西都是与西方文化整体联系在一起的，让它成为代表中国一部分学问的化身，就使中国学问丧失掉了它的真实面目和独特性。在这种忧虑之下，拒绝西方观念和范式在中国运用的主张和放弃“中国哲学”这一术语的要求就被提了出来。这样的说法如何呢？按照这种逻辑，撇开自然和技术领域，仅是中国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几乎所有领域所使用的近代翻译过来的大量源于西方的“术语”（许多是通过日本）都得放弃，用这些术语所命名的学科和学术分类都得改弦易辙。

且不说这样做的可能性如何，关键是这样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实质性意义。张之洞很早就拒绝使用“哲学”这一术语，因为他把“哲学”只看成是“西方之学”，因此试图以“名学”或“理学”代替“哲学”；王国维从普遍的立场出发，坚持认为哲学是中国的固有之学，只是用名不同罢了。当胡适、冯友兰和张岱年等先生用“哲学”这一术语分别书写《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国哲学史》和《中国哲学大纲》的时候，他们都认真思考了运用“哲学”概念的正当性问题，并从此出发建立起了为时代刻上了印记的中国哲学研究范式。按照张岱年先生的处理方式，“哲学”术语源于西方但“哲学”不等于“西方哲学”，因为他把“哲学”视为一个“共名”，在此之下，西方哲学、中国哲学和印度哲学等都是它的一个“属”。即使在西方，“哲学”概念也一直在发生着变化。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概念，就像我们没有固定不变的“哲学”体系和思想一样。如果不从类的观点考虑问题，即使在西方也照样会发生使用“哲学”概念的困境。因为“哲学”术语起源于希腊，如果只能把它与希腊相联系而有所谓“希腊哲学”，那么中世纪之后的“西方哲学”都不能称做“哲学”。“哲学”概念在中国也在发生着变化，我们不能说我们所说的“哲学”就“等于”西方所说的“哲学”。因此，问

题的关键不在于使用不使用“哲学”一词，而在于如何在使用中不断地为“哲学”赋予新的意义，而在于如何从中国哲学中发现哲学的丰富意义。同样，“中国哲学”也不是固定的产物，它会随着我们不断的理解特别是那种突破性理解而得到“转化”和“转生”。

我们确实需要正视运用西方范式和观念理解和认识中国学问所带来的许多负面性，且不说在教条化意识形态和“西方中心主义”之下那种运用所带来的严重不良后果。但解决问题的办法绝不能通过对术语的形式化拒绝来达到。严格来说，这些术语已经构成了中国文化的一个新的内在部分。正因为如此，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反讽局面，即大量使用着翻译过来的源于西方“术语”的人，却同时又一味地主张放弃这些术语。这样，在他们的这种态度之中，就不知道他们究竟是要求放弃这些“术语”还是要求放弃他们的立场。我们毫不保留地赞成检讨和反思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问题，并为不能在此做出有意义的工作而忧虑。一种积极的办法是，我们在“谨慎地”并通过艰苦努力以“有效地”运用外来范式的同时，也要努力从中国哲学中寻找出我们所需要的范式来。不从事这种积极性的工作，而只是从表面上做文章，说到底不过是自欺欺人。必须承认，在一种情绪式民族主义和廉价式保守主义之下，走出了“西方中心主义”和“反传统主义”的困境，同时也就落入到了文化上的“自我中心主义”和“孤立主义”的陷阱。用这种立场研究中国哲学，我不相信它会给我们带来什么鼓舞人心的东西。

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的确需要改变，明智的选择是在真正存在问题的地方加以改变；中国哲学史确实需要重写，谨慎的态度是要真正找到能够带来突破的重写途径。从不少意义上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哲学的研究已经有了许多积累，但这种积累还是远远不够的。客观上越来越要求我们摸索中国哲学研究的新方法、新方式并获得突破。公正的历史原则将一如既往地按照它的方式选择我们或者是抛弃我们。

带着中国哲学研究方法和范式更新的渴望，抱着激发问题意识和主题重建及新领域开拓的期待，在中州古籍出版社社长王关林、总编辑张存威、副总编辑郭孟良和编辑卢海山等先生的鼎力支持下，我们组织了这套“中国哲学前沿丛书”。宽泛意义上的“前沿”要求我们的研究能够体现出至少一个方面的特点：或者是新问题、新领域；或者是新范式、新方法；或者是新文献、新证据；或者是新探讨、新观点。即便这样，我们也仍然不敢说列入丛书的著作都能够达到这样的承诺，请宽容的读者在一个相对意义上理解处在“过渡时期”中的我们所说的“前沿”。

王中江

2002年10月24日

目 录

总序 王中江 1

引言 1

第一章 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后五四”
的中国政治 3

第二章 中国近代文化的第三条道路：
从调和论转向创造的综合 28

第三章 作为兄长和早期思想指引者的张申府 61

第四章 关于“全盘西化”、“中国本位文化
建设宣言”的讨论 82

第五章 创造的综合和文化的创造主义：

张岱年 20 世纪 30 年代的文化观	98
---------------------------	----

第六章 20 世纪末期的文化景观 123

第七章 张岱年的综合创新文化观 155

第八章 张岱年和后 “批林批孔” 时期的

儒学观重建	177
-------------	-----

第九章 文化主体性和民族精神的重建 197

第十章 综合创新文化观的继承与阐扬 231

第十一章 综合创新能否成为文化战略 257

主要参考文献 273

后记 282

熊十力在回顾 20 世纪 30 年代初由读经运动而引发的保守派和西化派的争论时说：“在此期论战中，余不能无感者。凡主张西化或外化诸论文，大抵皆零碎之谈。西洋人所以成功现代文化者，其根本精神为何，今后之动向又将如何，此皆吾人所欲知者。诸君子却未能注意及此。至主张读经者，世或议其素行为众所共唾，其言更无所采。”^① 其实这段话完全可以称得上是对鸦片战争以后激进派和守旧派在文化争论中所体现出的“情胜于理”状态的描述。熊十力的感受典型地体现出这样一种倾向，人们对于非此即彼式的文化讨论已经厌倦，人们期待一种能完整回答中西文化在冲突和交融过程中，到底会走向何方的认真讨论，期待一种能够反映文化发展方向的新的理论，而不是就事论事的对应式的策略。

可以说综合创新文化观，正是在这样背景下的一个产物。

综合创新文化观是张岱年对于文化问题的一个构想，既可以被

^① 熊十力：《读经示要》，第 50～51 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 年。

看做是对文化发展规律的一种描述，也可以被视为是对于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一种战略构想。

从 20 世纪 30 年代在《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的大讨论中，张岱年提出“综合的创造”的文化观，到 20 世纪末发展成综合创新文化观这个构想，这种文化观念从形成和完善跨越了半个多世纪，经历了社会变革和政治变迁等复杂的历史进程，因而也可以被看做是对于 20 世纪文化发展的一种整体性的回应。

我们知道，关于《中国本位文化的宣言》的讨论是张岱年提出综合创新文化观的最初缘由。因此，我们在对综合创新文化观进行具体分析之前，需要对产生这种文化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背景作一个全景式的考察，我们相信，思想的意义只有在与社会政治的互动中才能得到真正的体现。

第一章

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 “后五四” 的中国政治

金耀基是如此生动地来描述中国近代的历史的：“传统的古典的中国，近百年来，遭遇到亘古未有的挑战，产生了巨大深刻的形变。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屈辱的世纪，也是一个寻求富强光荣的世纪；这是一个失落的世纪，也是一个民族自觉最强烈的世纪。从悠远的历史底观点与广阔的比较底角度来看，这是中国传统解组的世纪，也是中国现代化的世纪。”^① 中国近代的历史有一个基本的主题是追求民族和国家的独立和富强。在这样的主题下，因为对于追求富强的途径的差异，或者说是对于导致中国落后的认识的差异，导致了在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尖锐对立和争论。是采取激烈的革命还是温和的改良，是中体西用还是广采西法，无不有其各自的代表人物。

但问题的焦点似乎越来越集中到文化问题上，无论是哪种立

^① 金耀基：《中国现代化的动向》，载金耀基等：《中国现代化的历程》，第3页，时报文化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0年。

场，最后似乎都把关注点集中到文化问题上，特别是进入 20 世纪之后，民族主义已经成为社会动员的关键因素，并发展出批判传统的态度和维护传统的对立形态。一方面，由全球性的现代化运动所带来的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反思和新式知识分子群体的出现，形成了激烈的批判传统的潮流，并最终会聚成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旧不两立的局面。另一方面，面对社会道德的堕落和新旧价值观冲突而产生的价值真空状态，一部分知识分子希望能从传统的道德中寻求文化认同的基础。而政治家和军事管理者们也开始纷纷寻求从宗教到传统文化在内的各种资源来整合精神和提升士气。

这种复杂的局面还需顾及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意识形态冲突，当中国共产党开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征服越来越多的人心的时候，中国国民党则试图以儒家和三民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反击，而日本对中国的军事侵略似乎使久被西化论所压制的文化民族主义情感得以凝聚，并最终呈现为“中国文化本位”这样的宣言。在这种政治和文化之间的纷繁复杂的背景下，身兼学者和政治活动家于一身的张申府和关心时事的张岱年，开始明确他们的文化主张，就是主张罗素、孔子和列宁三流合一的文化创造主义主张，并孕育出富有启发性的文化观念。

一、“后五四”时期国民党意识形态的整合与文化观的变迁

20 世纪的中国文化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呈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密切情状。按照林毓生的说法，就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思想方式是洋务运动、戊戌变法、清末新政等改革没有取得明显实效的情况下的逻辑推演，并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代得到典型的体现。“五四时代的知识

分子相信思想与文化的变迁必须优先于社会、政治、经济的变迁；反之则非是。反传统知识分子或明或暗地假定：最根本的变迁是思想本身的改变，而所谓最根本的变迁，是指这种变迁是其他变迁的泉源。”^①将文化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依据，反过来使文化讨论脱离了纯粹的学术范畴，导致所有的文化讨论都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甚至有些文化讨论本身就是政治策略的一部分。

所以，如果我们稍加留意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史，各种论战、争议不绝于耳，而且每一次论战均具有很强的政治意味，都承载着对于政治秩序、文化范型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多重设计。东西文化论战如此，科玄论战如此，“中国本位文化”讨论也是如此。

尤其需要提出的是，在众多的政治因素中，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之间的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党派利益的冲突日益成为文化争论背后的支配性因素。

20世纪20年代的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是十分复杂的，一个意味深长的事件就是“中国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孙中山交谈之后，1922年共产国际便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的想法，并付诸实施。不过，双方的党史作者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合作有不同的描述^②，而且各自的动机也不尽一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方面来说，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实质上这里讲的是一种策略手段，旨在通过国民党向与它有联系的工人群众组织渗透，并从国民党那里夺取这些工人群众和组织，同时在国民党内部建立稳固的共产党集团，实际上也就是分裂国民党，由共产党人夺取国民革命运动的领导权”^③。

① 林毓生：《五四时代激烈的反传统思想与中国自由主义的前途》，见氏著：《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第168页，三联书店，1988年。

② 可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三章，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③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第25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

而就孙中山而言，“容纳共产党”则有更多的考虑。孙中山想借鉴苏俄的办党建军成功经验，“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①。“从前在日本，虽想改组，未能成功，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②孙中山对于中国人缺乏凝聚力和组织性的“特性”一直痛心疾首，而苏俄共产党的善于组织刚好是国民党所欠缺的。

虽然仿效俄国以主义治国，但孙中山并非是要在意识形态方面借鉴共产主义的观念。孙中山认为共产主义并没有特别之处，虽然他也说过“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③。但从根本上他是认为“所谓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与集体主义均包括在民生主义之中”^④。

孙中山和国民党在意识形态的建设上比较倚重“民族主义”的作用，无论是一开始借助民族主义进行“排满”革命，还是后来利用民族主义反对“帝国主义”，都是基于民族主义的立场，对此胡适有过精到的分析。他说：

根本上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的运动，自始便含有保守的性质，便含有拥护传统文化的成分。因为国民党本身含有这保守性质，故起来一些保守的理论。这种理论便是

① 孙中山：《在广州大本营对国民党的演说》（1923年11月25日），载《孙中山全集》，第8卷，第437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② 孙中山：《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1924年1月25日），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第137页。

③ 孙中山：《三民主义》，第167页，岳麓书店，2000年。孙中山发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很流行，因此力图找出两者之间的关联，以增加人们对三民主义的注意。同上书，第170页。王奇生也说：民生主义和共产主义同等起来是为了迎合五四青年对社会主义的信仰，或者说是为了将当时知识青年对社会主义的崇拜，吸引和转移到对三民主义的信仰上来。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第60页。

④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上），第22～23页，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

后来当国时种种反动行为和反动思想的根据了。

中国的民族主义的运动所以含有夸大旧文化和反抗新文化的态度，其根本原因也是因为在外力的压迫之下，总有点不甘心承认这种外力背后的文化。这里面含有很强的感情作用，故偏向理智的新文化运动往往抵不住这种感情的保守态度。国民党里便含有这种根据于民族感情的保守态度，这是不可讳的历史事实，国民党的力量在此，他的弱点也在此。^①

虽然胡适将新文化运动看做是“理智”的、将保守主义看做是“情感”的值得商量，但是国民党与民族主义之间的共生关系是存在的，并且当国民党发现共产党的力量迅速增长的时候，其所能对共产主义提出的反击武器依然是民族主义。

国共合作一段时间之后，国民党很快便发现国共合作的结果是共产党得到了很快的发展，不仅在组织上，而且在思想意识上均呈现出一定程度的强势。就组织而言，当时有许多青年国民党员加入共产党，当时的《现代青年》有一篇文章说：“‘容共’政策，年来所得的结果怎样呢？在外说得了不少的成绩，但在内容说，我敢老实不客气的说，已经不是国民党‘容共’，实是共产党‘容国’了，试看国民党青年，革命性丰富一点的，因为国民党组织散漫，纪律不严之故，无人指挥，欲工作而无从，最容易被拉入共产党，那国民党已经成了入共产党的桥梁。这种事实，谁都不能否认的。”^②

在实际的工作中，由于1926年5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党务案》后，共产党被迫离开国民党的上级机关后，将工作重心进一步落实到基层民众中去，这也引起了国民党高层的忧虑。

而共产党在思想意识上的强势地位则体现在宣传的能力和吸引力

① 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载《新月》第2卷第6、7号合刊，1929年9月10日。

② 李焰生：《“容共”政策与“联共”政策》，载《现代青年》第73期，1927年4月9日。